

# 我在我城的曾經與現在

## — 隱地散文中的臺北書寫

[臺灣]黃文成\*

### 目 录

- 一、空間與時間的對話
- 二、離散的年代 / 混雜的青春
- 三、臺北城裡咖啡館中的書寫靈魂 / 靈魂書寫
- 四、咀嚼臺北 / 食飲人生
- 五、漫遊我城 / 我城傾斜
- 六、結語

## 一、空間與時間的對話：

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1956- ) 曾提出「感覺結構」的性質和特定歷史表現。他認為在整個生活中複雜的一般組織，只有全經由真正的「生活經驗」，才可能被知道，因為，它是一種「感覺結構」，「在特殊地點和時間之中，一種生活特質的感覺：一種特殊活動的感覺方法」結合成為「思考和生活的方式」。<sup>1)</sup>

而韓良露 (1952- ) 在〈話說臺北〉對談裡提到：「一個人必須對一個城市至少要有三十到五十年的耳濡目染，才會在書寫城市時有足夠時間層的厚度。很多年輕人來書寫城市也是有趣的事，可是城市有時間的身世，當我們自

\* 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1)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2002)，頁92。

己也有時間的身世時，才會在裡面看出城市的年輪。我是四、五歲就在臺北吃東西，又在臺北長大，我現在四十八歲，等於在臺北吃了四十幾年，我發現我書裡出現的餐廳，幾乎是臺北過去四、五十年的重要餐廳，大概百分之九十都在書裡頭，這時自然會涵蓋足夠的廣度和厚度。」<sup>2)</sup>。是的，只有在一個地方活得夠久，地方的氣味成為生命裡的核心時，才可以對所居住的地方產生生命裡的共鳴。而諾伯格·斯卡爾茲 (Christian Norberg-Schulz, 1926-2000) 也提到，一個地方的認同感，在於從生命裡出發看這個生存空間，同時也是人格形塑的過程，他說：

當場所和四周互動時，就產了內部和外部的問題。於是這種現象學的關係，就成了生存空間的基本觀點。「在內部」，顯然是跟在場所觀念之後的最初意圖，那也就是說，在某處遠離內部的地方就是「外部」。只有當一個人界定何者內部是外部時，我們才能說他「居住」了。通過這種連繫，人們界定了他的經驗和記憶，而空間的內部就變成了個人「內部」的表示。如此，自證 (identity) 與場所的經驗密切連繫，特別是人格被塑造成形的時候。<sup>3)</sup>

城市空間的組織、建築設計都是特定文化符碼的具體化。而某些城市累積了傳統、歷史與藝術的基礎，擁有令人讚嘆的建築與景觀，帶給人們強烈的空間與集體認同感。<sup>4)</sup>此外，詹宏志 (1956- ) 對於都市 / 空間提出了幾項個人的看法：

- 1、 空間記錄了時間，而人，也屬於空間。人，誕生在一個空間點上，有了出生地。成長在一個環境裡，就有了成長地—或者稱為故鄉。<sup>5)</sup>

2) 韓良露、李清志 (1963- )、楊澤 (楊憲卿, 1954- ) / 對談, 許正平記錄,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6年10月11日, B7。

3) Christian Norberg-Schulz, 《實存·空間·建築》(*Existence, Space and Architecture*), 王淳隆譯臺北: 臺隆出版社, 1984, 頁24。

4) Mike Featherstone, 《消費文化與後現代主義》(*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趙偉紋譯 (臺北: 韋伯文化國際, 2009), 頁93-96。

- 2、記憶有兩軸，一軸是時間，一軸是空間，兩軸標示的任何一點，都代表了一種可能的生活經驗，你實際上行經的點，就構成了你的生活軌跡。<sup>6)</sup>
- 3、標示了時間，標示了空間，我們回到那感覺交會之點，就構成記憶。<sup>7)</sup>

所以記憶本身包含了時間與空間。作品的書寫，本身也在時間與空間兩個軸心中來回形成記憶的回溯。王志弘則認為，關於都市自身即是一種論述、正文或表意系統，可以有更為積極的觀點。都市若是正文，則其中的活動者不僅是閱讀者，也是寫作者。<sup>8)</sup>

以此，與父親同國民政府從大陸撤退到臺灣來的隱地，自小成長以來，看著臺灣 / 臺北城的變化，從寄人籬下，爾後在臺北城不同區域不斷搬遷，最後定居在廈門街，隱地散文書寫一如上述所說，從上海來到臺灣的隱地，對於臺灣 / 臺北城的認同感，書寫的空間亦隨時間的漂移，或擴大或聚焦，且經透過書寫的內在機制，作者便是檢視生命裡每個階段的變化與成長。隱地書寫生命裡發生在臺北城這個空間的故事同時，其實也是回顧了生命裡每一個走過巷弄間的自己與他者生活圈的蛻變。他說：

十歲從上海來臺北，我在臺北已經居住五十八年。從臺北小孩變成臺北老人。從走得到的臺北，走成走不到的臺北；如今臺北離我愈來愈遠，我來往的臺北愈來愈小。<sup>9)</sup>

這是隱地居住了臺北近一甲子後寫下的心得。我們從隱地散文書寫中，可以發現，他的散文對於臺北城的眷戀與情感，是有其歷史背景支撐。青少年成

5) 詹宏志, 《城市人—城市空間的感覺、符號和解釋》(臺北:天下文化, 1989) 18。

6) 詹宏志, 頁19。

7) 詹宏志, 頁16。

8) 王志弘, 《流動、空間與社會》(臺北:田園城市文化, 1998), 頁146。

9) 隱地, 《身體一艘船》(臺北:爾雅出版社, 2005, 頁) 39。

長的一切記憶，緩緩地出現在隱地散文筆中活脫地走出來。<sup>10)</sup>

於是隱地書寫臺北時與韓良露般，在臺北城裡空間和時間軸線上，來回穿梭回憶，書寫出屬於臺北市的文學地景，充滿了故事性，其中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飲食習慣與特質，也成為重要的書寫內容之一。文人精神向度有其領域，且是對生命層面具有某種程度的批判性。隱地書寫所居住的臺北，總能發現這臺北的美好，但卻也同時存在著城市發展後的負向的改變，包括機械化後的城市風格，僅剩沒有美感經驗的都市容貌。

## 二、離散的年代 / 混雜的青春：

曾經是牯嶺街少年 / 寧波西街的灑水車 / 南昌街上的小人書租書店 /  
還有樟州街和克難街 / 都有我青少年的足跡和記憶<sup>11)</sup>

本名為柯青華的隱地（1937- ），十歲隨父親自上海來臺北，暫居於寧波西街等地。爾後不斷搬遷的經驗，對於隱地而言是個沉重的記憶。而隱地童年在這個充滿中國圖騰的地圖上，來回翻轉，同時也成就了他書寫生命史裡重要的一個基礎元素。

隱地個人生命史如何與整個大時代，做極大值的串聯？或許，這就是近代中國人命運多變的一小角。在那個年代，國民政府將中國地理深深烙印在臺北都市面貌上，企圖以一種獨特的方式註冊它對一塊遙遠土地的記憶。接續日本於一九二〇年日化下的「町名改正」之後，國民政府將中國版圖上的省分強加對應於臺北的街道中，完成另一次路街命名。提供了戰後撤退臺灣的外省人在

10) 關於隱地童年 / 青少年研究，許秦綦〈追憶「走過的年代」——隱地《漲潮日》中的文化地理學〉收入《博雅通識—三校教師文史成果發表會論文集》（桃園，萬能科技大學，2006）一文中，對本文研究對象，有極深刻詮釋。此文運用文化地理學來開展論述作者個人生命史，也啟發本論文研究方向與領域。

11) 隱地，《法式裸睡》（臺北：爾雅出版社，1995），頁141-42。

街道與家鄉名稱相同的經驗，進而產生安慰離鄉者的作用，完成「收歸中國版圖」的政治象徵。<sup>12)</sup>只是，這樣的結果，造就了這群外省人認同臺灣土地的進度與態度，反而延遲了統治者原本想達到的效果。

空間的表徵就其廣義而言，即處理空間之文化形式的問題，而其主要操作方式與樣態是呈現、再現與表意實踐。<sup>13)</sup>那麼，大歷史與小敘事之間的記憶與觀點，往往會有極大的落差感存在。隱地從上海來臺之後，在充滿中國圖騰下的臺北街道之間來回穿梭，個人生命的歷程與大中國敘事下的臺北街道，沒有起緩和的作用，反而因大人之間的現實問題，讓生命不斷在這中國圖騰間流轉、再流轉：

搬出原先北一女讓我們居住的寧波西街宿舍，沒有自己房屋，只好不停的租房子住。十年內將近搬了二十次家，昆明街、上海路、新店檳榔坑、雙城街、博愛路、漳州街、南昌街、克難街、廈門街、北投公館街……再搬回廈門街。隨著自己額頭眼尾皺紋增加，使我和臺北每一條街道巷弄，幾乎都有一種熟悉和親切。不過可能實在是因為搬家搬得太多了，我對遷移有一種潛意識的恐懼。<sup>14)</sup>

來臺後的隱地，自我人格的養成，逐漸在這一方天地裡型塑出來，以下便就隱地少年青春地圖，進行分析討論。

### 1、嬉遊西門町

Mike Crang在《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裡將地景比喻為一張「刮除重寫的羊皮紙」：刮除重寫一詞衍生自中世紀的書寫材料。這指涉的

12) 洪月卿，《城市歸零——電影中的臺北呈現》(臺北：田園城市文化，2002)，頁46-48。

13) 王志弘，頁75。

14) 隱地，《盪著鞦韆喝咖啡》(臺北：爾雅出版社，1998)，頁119。

是刮除原有的銘刻，再寫上其他文字，如此不斷反覆。先前銘寫的文字永遠無法徹底清除，隨著時間過去，所呈現的結果會是混合的，刮除重寫呈現了所有消除與覆寫的總和。因此我們可以用這個觀念來類比銘刻於特定區域的文化，指出地景是隨著時間而抹除、增添、變異與殘餘的集合體。<sup>15)</sup>

據莊永明的界定，現在西門町商業區大致的範圍為：東起中華路，西至康定路，南起成都路二段，北至漢口街，包括昆明街、西寧南路、漢中街、峨嵋街、武昌街二段，衡陽路與寶慶路等。日人統治臺灣之後，拆除臺北城作為其行政與商業中心，後來日本移民越來越多，城中區已不夠容納，於是就將西鄰的這塊荒地，清墳除草，並建立起日本人的商業、娛樂與居住的地區，1922年廢原有街道名，分臺北為64町與郊外10村落，近原臺北城西門一帶，遂叫西門町，1920年代末，日人陸續在西門町開設一些時髦行業：包括收音機行、腳踏車行、汽車行、旅社、浴室、遊藝場、運動器材行、音樂茶行、公共食堂、照相館、洋裁店……等，此外，還建立了日式風格的電影院、劇院等，為西門町奠下了獨特文化面貌的基礎，延續至戰後。總而言之，在日治時代時，西門町已成為臺北市最大的電影街、及零售業與娛樂中心。其風貌與萬華及大稻埕商業區的臺灣本土風味，截然不同，帶有強烈的東洋殖民色彩。戰後日人遣返日本，西門町遂有臺灣人擁入，設攤打舖蓋，加上1949年大陸淪陷之後，大批大陸移民來臺，政府為了安頓一些大陸來臺的小商人，沿著縱貫鐵路兩側，由北門到小南門，搭蓋三列臨時棚蓋，以容納這些大陸移民，於是出現了大陸上南北各地口味的飲食店及小商店。這時候，上海商人扮演一個重要角色，也就是把一些上海的東西搬至西門町，如紅包場歌廳、音樂咖啡廳、舞廳、酒樓……等引進西門町，使西門町開始繁榮。<sup>16)</sup>

年少時光在西門町長大的隱地，對於西門町有著複雜的情感，其中包括全家在臺灣的第一個落腳處，爾後又不得不離開此一居所，就離西門町不遠處，整個西門町亦是他成長歡樂時光的場域，於是西門町對隱地而言，在當時具有

15) Mike Crang, 《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 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 (臺北: 巨流文化, 2005), 頁22。

16) 薛益忠, 《都市地理》(臺北: 三民書局, 2006, 頁) 214-15。

多種複雜情感之所在，在他臺北書寫內容時，西門町的時光，便是他常常書寫的主題之一：

寧波西街有我傷心的往事，也曾讓我失去尊嚴。特別是父親，他走在寧波西街的日子很少抬頭挺胸，我相信，是憂鬱，讓父親比母親早走了二十二年。後來母親也走了，如今只有我還不時地會到寧波西街走走。……這條陌生的又熟悉的街，是當年父親母親從上海到臺北最早落腳的地方，也是我童年成長的原鄉。<sup>17)</sup>

落腳寧波西街的隱地一家人，其實同時也見證了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的轉變。只是他們生活的生活圈，還是在一個中國概念移植下的城市空間，於是隱地對於這些屬於中國城市的圖騰，全然不陌生。但隱地也同時接觸到自中國以外的臺灣道地生活與文化圈：

有一段時期我們搬到昆明街，隔壁二樓是一家酒家，一到夜晚，猜拳聲淫笑聲好像都在天空裏迴旋，晚上睡不著只好到馬路上閒逛，轉一個彎就是大世界戲院，最後一場電影散場了，我只好回家睡覺，然而隔壁酒家仍然歡笑滿堂。……不久我們搬得遠遠的，搬到重慶北路，一個非常陌生的環境，和西門町及南門市場的景觀完全不一樣。

我開始接觸圓環，吃魯肉飯，肉羹、五香肉卷、蚵仔煎。我也知道了歸綏街的江山樓，……第一劇場、國泰、國聲、大光明……變成另一區我常涉足的電影院。<sup>18)</sup>

隱地成長的那張青春地圖，夾雜了成人世界裡的變動與不安，所以隱地散文書寫裡，常回到曾經的青春帝國，讓書寫療癒記憶裡那段黑暗期。也因其個人生命的歷經，而成就型塑屬於他自己獨一無二的「地方感」。這種「地方感」是一種自主心靈的產物，心靈自由地詮釋情感的世界——記憶、意義，以

17) 隱地，〈漲潮日〉，《漲潮日》（臺北：爾雅出版社，2000），頁33。

18) 隱地，《漲潮日》，頁66。

及源自自主意向所鼓舞的自主行動的情感。<sup>19)</sup>因此隱地書寫屬於他成長記憶中的重要聚點—西門町的「地方感」，便充滿了他個人生命經驗裡的記憶與意義的疊合。

李振亞於〈歷史空間 / 空間歷史—從《童年往事談記憶與地理空間的建構》〉一文提及：「空間是社會生活和歷史生活經驗的產物」——臺北用一種獨特的方式註冊了它對一塊土地的記憶。在臺北街頭閒蕩，我們經常會闖進一個接著一個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紹興、吳興、杭州，或者是重慶、昆明。一條條的街道，透過它們的名稱，遠遠的紀念著千里外一個個的都市。<sup>20)</sup>李振亞於同文引用了班乃迪·安德生 (Benedic Anderson, 1936- ) 在 *Imagined Community* 論述東亞和東南亞的殖民歷史開展，全然不同於上述西方近代殖民的路線。相對於西方「新」、「舊」同時並存的地理模式，亞洲殖民大多是一種薪火相傳的歷史模式。亞洲的殖民並非如西方一般以帝國首都為中樞神經，加以計畫派遣；剛好相反，亞洲的殖民往往是因為帝國首都的崩潰，才導致移民潮的湧現，因逃難不得已背離鄉土的移民，到了新地方翻製舊家園，主要的動機是香火的承續，不是文化的擴散：「新舊一脈相傳，來者往往祈求逝者的祝福」。從這「同時並存」(synchronicity) 和歷史傳承 (diachronicity) 的對比來看，安德生的解釋頗能夠說明臺北和中國之間的歷史關係。將陌生的土地名以自己熟悉的地名，除了方便殖民主更快的認識和掌握新的地理環境之外，也暗示了他保存甚至進而復興「固有文化」的決心。從這個「香火」歷史觀出發，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舊鄉土遭到「覆滅」之後的一切歷史發展都必須視之為誤入歧途，加以否定，同時其地理的面貌也必須加以凝凍，在懷鄉的記憶中永遠封存，否則新土地的複製就無所依憑。歷史和地理、時間，都必須永遠的停格。臺北是一塊不具面貌的空地，沒有任何過去的歷史或地理意義；中國則是一段凝結的記憶，沒有任何未來的歷史或地理意義。將臺北的空間

19) 夏鑄九，頁88。

20) 李振亞，〈歷史空間 / 空間歷史—從《童年往事談記憶與地理空間的建構》〉，《戲戀人生——侯孝賢電影研究》，林文淇、沈曉茵、李振亞編，（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頁113。

裡，無論是實際的或象徵的，塞滿中國的符號遺跡，臺北就變成了中國。<sup>21)</sup>

## 2、西門町 / 電影院的少年追想曲

西門町的一帶，一直是隱地書寫臺北城的一個重要據點。起因於他住過昆明街上的國賓戲院對街，且在戲院門口賣過報紙。所以年少時對於電影就起了某種情感上的移情作用，看電影也成為他生命中一個重要時刻。他崇拜的偶像除貓王艾維士普里斯萊，就是詹姆士狄恩；後迷戀雷震主演的《金蓮花》等電影，一度想以「柯震」當其筆名，但因父親名字為「柯豪」，柯豪和柯震放在一起，不像父子，有點像兄弟，讓他覺得沒大沒小，於是捨「柯震」而成為「隱地」。<sup>22)</sup>〈少年追想曲〉一文中，道盡他年少時期對電影想像的崇敬之情：

走到南昌街右轉，平時我的活動範圍最多到福州街口，就再也不敢走遠，怕走遠了認不得回家的路。但那天我似乎無路可退，也不敢立即回家，就繼續地走，來到圍著竹籬笆的明星戲院，我看看玻璃櫥窗裏的劇照，望望竹籬笆上貼著一張張電影海報，就這樣磨菇來磨菇去，看著電影院裏的觀眾走出來，也看著外面的觀眾走進去。<sup>23)</sup>

崇拜 / 追星的態度，在少年隱地也是有的，因現實生活壓力導致在精神領域，需找一窗口透氣。隱地少年青春期除面對家庭經濟壓力外，隱地曾坦言母親精神狀況不是很穩定，有時被母親追逐逃出家門，逃家的地點，總是明星戲院。<sup>24)</sup>或許，電影院裡放映出來的虛構故事，可以補足青少年時期的動盪與不安的現實，才讓隱地對於西門町電影院的記憶是如此的深刻。即便後來的電影

21) 李振亞，頁116-17。

22) 隱地，《漲潮日》，頁121。

23) 隱地，《漲潮日》，頁111。

24) 隱地，《隱地極短篇》（臺北：爾雅出版社，1990），頁156。

院，不再純然地上演電影，隱地對這些戲院，還是深深地懷念著，包括他回憶起西門町各家電影 / 戲院的種種：

電影院在我記憶中有五六家，美都麗、國際戲院、臺灣大戲院、第一劇場和大世界。中華路的大華戲院，專門演場紹興戲。……一度成為同性戀大本營的紅樓戲院，也上演過好長一段時間的越劇。<sup>25)</sup>

到戲院看地方劇，也是當時家庭活動 / 聚會重要時刻。即使已經結了婚的隱地，假日時還是會跟他的太太林貴真（1941- ）從北投坐著公路局到西門町看電影。<sup>26)</sup>只是，時光像一條河流，不斷往前流，留下的也只有記憶，在〈五〇年代的臺北〉就寫下了他的心得，只是記憶中的西門町已然成為記憶的一部分了：

少年時代的我，青年時代的我，在西門町不知道壓過多少馬路，然而，即使我有心要去回憶，回憶仍然回不來。今天的西門町，已不是我記憶中的西門町，今天的西門町，倒更像我五年前去過的日本新宿和原宿，新宿比較色情，原宿比較藝術，西門町在色情和藝術之間擺盪。一波波走過來的男女全是青少年，全是新人類。啊，時間，當時間和空間擦身而過，魔術師已在我們身上調了包、施了法，五〇年代的人正一波波黑髮變白髮，不停的在和九〇年代的人揮手說再見<sup>27)</sup>

### 3、中山堂 / 新式百貨公司商場

西門町的歷史發展及位置，在前一節已敘述過。也因為它的地理位置與清朝、日治時期統治階級和後來的國民政府權力中心相當近，於是自然地留下了許多歷史建築，其中最重要的一座建築，就是中山堂。中山堂在隱地的臺北書

25) 隱地，《漲潮日》，頁147。

26) 隱地，《盪著鞦韆喝咖啡》，頁196。

27) 隱地，《愛喝咖啡的人》（臺北：爾雅出版社，1998），頁101。

寫裡，是生命裡重要的舞臺與記憶空間。〈遠近中山堂〉一文中，引秀山街碑文記載了中山堂的由來：「中山堂為清臺灣布政使衙舊址。公元一八九五年，臺灣割讓，日軍踞為近衛師團司令部，嗣再用為總督府辦公廳舍。民國十七年，日人為紀念日皇裕仁登基，拆除清朝布政使衙，改建臺北公會堂，至民國二十五年完成，為臺北文化活動最主要展演場所，臺灣光復，改稱中山堂。」<sup>28)</sup>

這座改建後的百年歷史建築物，功能性也隨之改變，裡頭除設有演藝表演廳之外，尚有西餐廳、理髮廳等空間。隱地說他在十五歲時，認得臺北市建築物只有西門町的中山堂和臺北火車站。而青年時期與女孩們約會，便以這兩座地標為約會場所。青年時期與女孩們約會，總不離中山堂。直至退伍後的第一份工作，也還是圍繞在中山堂附近，所以中山堂這一臺北地景，自然成為隱地書寫臺北時重要的文學地景之一。

隱地書寫西門町，除電影／戲院之外，新式百貨商城也是他青春時期，烙印在記憶中的一個重要空間場域，〈五〇年代的臺北〉就書寫下這樣一段話：

臺北最初只有一家百貨公司，就是位於博愛路的「國貨公司」，由於「國貨公司」擁有電梯，又是一棟七層樓的建築物，當年可是無限風光，中南部的民眾到臺北第一件大事就是逛逛「國貨公司」。那年頭，七層樓就是摩天大樓，只要能走進樓房，對當年九成九都住在平房的民眾來說，都算十分稀奇。<sup>29)</sup>

除「國貨公司」公司之外，還有另一家「建新百貨」。這些新式百貨商城的自動大門、電扶梯，都成為隱地懷想西門町生活史中重要的時空場域。

一座擁有歷史血統的中山堂建築物，與新式民生歡樂消費的百貨商城比鄰而居，或許是當時國民政府傳承至日治時期以來，統治者鞭撻政策的一項具體展現。

28) 隱地，《自從有了書以後》（臺北：爾雅出版社，2003），頁137。

29) 隱地，《漲潮日》，頁146。

### 三、臺北城裡咖啡館中的書寫靈魂 / 靈魂書寫：

吳潛誠曾論述楊牧（1940- ）與陳黎（1954- ）的花蓮地誌書寫時，說到：

地誌詩篇具體的描寫地方景觀，它幫助我們認識、愛護、標榜、建構一個地方的特殊風土景觀及其歷史，產生地域情感和認同，增進社區以至於族群的共同意識。而在地誌詩篇中，風景的每一條輪廓都隱含著社會及其文學。<sup>30)</sup>

文化地理學者珍·雅各（Jane Jacobs, 1916-2006）對於城市的地標，有著重要的論述：地標，正如同這個詞彙所代表的意義，是方向的主要線索。但是好的地標在城市裡面還扮演其他兩個釐清城市秩序的功能。首先，它們強調（同時也尊敬）城市的多樣性；它們是靠吸引人們注意到它們與周邊鄰居之間不同的事實，而且因它們的不同而顯得重要。這個有關它們自身的明確陳敘隱含一個有關城市的構成和秩序的陳述。其次，在某些情況下，地標可以讓我們看到在功能上重要的地區，在視覺上面也同樣會受到肯定和尊敬。<sup>31)</sup>

在隱地所有關於臺北書寫作品中，有幾個文學地景不斷地出現，包括了上一節談的電影街、中山堂。此外，「明星咖啡館」及「朝風咖啡」兩家咖啡館的書寫，更是佔了極重比例。以下便就隱地臺北書寫中兩個最重要的文學地景，進行論述。

30) 吳潛誠（1948-99），〈地誌書寫，城鄉想像——楊牧與陳黎〉，《島嶼巡航：黑倪和臺灣作家的介入詩學》（臺北：立緒文化，1999），頁83-84。

31) Jane Jacobs (1916-2006)，《偉大城市的誕生和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吳鄭重譯（臺北：聯經出版社，2007），頁416。

## 1、明星咖啡館

關於明星咖啡館的書寫，白先勇（1937- ）早年對「明星咖啡館」專文書寫，篇名就是〈明星咖啡館〉。他這樣地寫著「明星咖啡館」：

明星大概是臺北最有歷史的咖啡館了。記得二十年前還在大學時代，明星便常常是我們聚會的所在。那時候，明星的老闆是一個白俄，蛋糕做得特別講究，奶油新鮮，又不甜膩，清新可口，頗有從前上海霞飛路上白俄西點店的風味。二樓陳設簡樸，帶著些許歐洲古風。那個時期，在臺北上咖啡館還是一種小小奢侈，有點洋派，有點沙龍氣息。幸而明星的咖啡價錢並不算貴，偶爾為之，大家還去得起。<sup>32)</sup>

明星咖啡館除了本身帶著與故國記憶與洋派風味外，它不斷地引起臺北藝文人士趨之若鶩的原因，大概還有一景，是早已成為臺北文學地景經典之一的：周夢蝶（1920）與其書報攤。白先勇同時對此一場景，書寫於〈明星咖啡館〉一文裡：

明星在武昌街，靠近重慶南路，門口騎樓下有一個書報攤，這個書攤與眾不同，不賣通俗雜誌，也不賣武俠小說，有不少詩集詩刊，也有『現代文學』，那便是孤獨國主周夢蝶的詩之王國。周夢蝶隱於市，在車馬喧囂中，參悟到明年鬍髯的眼中，虞美人仍舊抽發茁壯。<sup>33)</sup>

明星與周夢蝶成為臺北重要藝文地景，在隱地散文作品中，便反覆書寫到這一臺北最獨特的文學地景影像，〈到明星看作家〉：

從前的明星，也是我寫作的地方。

明星咖啡館所以令人懷念不已，一來，樓下走廊有周夢蝶的詩歌鋪

32) 白先勇，〈明星咖啡館〉，《明星咖啡館》（臺北：皇冠雜誌社，1984），頁63。

33) 白先勇，頁63。

（雖然只是一個書攤，但如果加裝一個屋頂，不就成了個性書屋），是當年的「臺北十景」之一（一點也不假，我聽焦桐、曾堯生等說過，年輕的時候到臺北的第一件事，先到武昌街明星咖啡館樓下看周夢蝶的詩書攤）；其次，傳說樓上的明星咖啡屋裡永遠有許多作家正在寫作，有人所以也上樓叫一杯檸檬水，其實只是想看看黃春明、林懷民、白先勇、雷驥、陳映真、季季等作家，如果真的撞見了，讀者會覺得他喝的檸檬水值回票價。<sup>34)</sup>

來回臺灣與國外之間的白先勇，其實也發現臺北咖啡館的多變性，只是隨著時代移轉的咖啡味，總還是記憶中的明星咖啡館味道最對味：

這幾年來，臺北滄海桑田，面目全非，腳躡街頭，有時竟不知身在何方。東區新建的高樓大廈，巍巍然排山倒海而來，目為之眩。臺北飯館多，其來有自，但是這次回來，我發覺臺北的咖啡館，竟也大街小巷，櫛比鱗次了起來，猶如雨後春筍，完全取代了早年「純吃茶」。而裝潢之瑰麗，五光十色，紐約東京瞠乎其後。有些名字取得妙——「夢咖啡」。聽說還有一家叫「杜鵑窩」的，不知道什麼人去光顧，價錢也不對了，坐下去就是六十塊，咖啡味道倒未必佳。或許是我的偏見，這些新興的咖啡館，豪華是豪華，但太過炫耀了，有點暴發戶。我還是喜歡武昌街上那間灰撲撲的明星，明星的咖啡，明星的蛋糕。二十年來，香醇依舊。<sup>35)</sup>

子敏（1924- ）對於明星咖啡館的書寫，也有相當的篇幅，甚至將它的地址也入其文內：

另一家有高知名度的文人咖啡館是武昌街七至九號的「明星」。……。在地緣上，「明星」接近重慶南路一段的書店街，也接近火車站，逛書店的文友想找個地方坐下來談談，臺北的文友跟北上的南部文友約會，「明星」是一個方便的地點。「明星」在武昌街，地方比較僻

34) 隱地，《自從有了書以後》，頁104-05。

35) 白先勇，頁64。

靜，又是在二樓，更有隱密浪漫的氣氛。這是它受文人歡迎的原因。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明星」本身並不是一家十分出色的咖啡館。……

「明星」的高知名度，不來自咖啡和西點，也不來自咖啡館的布置，而是來自出入咖啡館的文人。出入「明星」的文人，當年也沒為它帶來什麼知名度。當年文人中不知道「明星」在哪裏的，也還多的是。「明星」是夠隱秘的。「明星」真正有了高知名度，是當年出入「明星」的文人也有了自己的高知名度以後。他們在回憶錄式的作品中，一再提起這家咖啡館，以及在咖啡館下擺書攤的一位詩人。這樣說來，「明星」的成名是在它的「晚年」，不在它的「盛年」。

在「明星」樓下擺書攤的詩人是周夢蝶。「明星」的樓下是一家茶莊「鴻達茶莊」。周夢蝶就在鴻達茶莊店門前的騎樓下擺了一個小小書攤賣書。那是民國四十八年的時候，周夢蝶四十歲。<sup>36)</sup>

明星咖啡屋經營者簡錦錐（1932- ），在他個人回憶錄《武昌街一段七號》裡就敘述這群臺北藝文圈人士之所以集結在此書寫創作的狀況：

因為周夢蝶的書攤，明星衍生出一股濃厚的文學風氣，越來越多藝文人士在此二樓、三樓聚集和寫作。<sup>37)</sup>

簡錦錐對於這群熱愛文學創作者，是抱持歡迎態度，從不因消費低而有分別心。他認為，在明星寫作的人，多半對文學有高度熱忱，不只是賺點稿費而已。或者，更正確地說，這些人寧可餓肚子，也不願放棄寫作。領班見這些客人點一杯飲料就霸著位子一整天，忍不住想上前勸離，都被他揮手擋下。<sup>38)</sup> 1989年12月11日，明星咖啡館面臨歇業時刻。作家嘆氣，說是藝文界造的孽，長期佔據卻少消費，讓明星蝕本無歸。外國友人不捨，說是往後很難再找到如明星這樣自在的地方，臺北的味道從此淡了許多。媒體界惋惜，說是少了明星這個藝文地標，往後文學創作者將失去一個可以提筆為文的園地。<sup>39)</sup>明星歇業

36) 子敏，〈約會在朝風〉，《愛喝咖啡的人》，頁218-19。

37) 簡錦錐口述，謝祝芬撰文，《武昌街一段七號》（臺北：圓神出版社，2009），頁131。

38) 謝祝芬，頁132。

後的原址，租給居仁堂經營素食餐館，但因2004年因一把無名火燒光，也因這場無名火燒出藝文圈及媒體的關注，讓明星咖啡館有了再次出發的契機。

## 2、朝風咖啡館

早期年代裡，中山堂附近的咖啡館，也是隱地駐足的地方，尤其是「朝風」，更是當時人文雅士聚集場所。除明星咖啡館之外，朝風咖啡館，是其中重要的文人聚會場所之一，隱地對於朝風的描繪，也有深入的探究。在〈遠近中山堂〉就有一段屬於朝風的書寫：

朝風咖啡在永綏街十八號，隔壁是三光儀器行。朝風前身是四姊妹咖啡館，臺北最初的豪華，就是從這一家咖啡屋向四周放射出來的。妖嬈之後變得古典，臺北的一點點西方音樂常識，也都是「朝風」帶動的，甚至臺北最初幾個音樂家也在朝風誕生。<sup>40)</sup>

子敏〈約會在朝風〉一文便是對此一文學地景有深刻的描述：他先敘述中山堂的地理位置：

中山堂以「擁有三條五百公尺左右的短街」聞名。中山堂北側，有「西陽街」。中山堂的南側，有「秀山街」。中山堂的正前方是廣場，廣場的東端是「永綏街」。永綏街的南側，有一家「中英大藥房」。藥房的西鄰，有一家咖啡館，店名叫「朝風」。「朝風」成為報館的編輯、記者、作家、詩人的約會地點。中山堂廣場沒有像巴黎那樣的露天咖啡座，「朝風」至少是在廣場的邊緣。報館編輯跟作家，詩人交誼，常常約好在「朝風」見面。「拉稿」，甚至是不得已的「退稿」，都在那裏「低聲」進行。咖啡館有咖啡館的氣氛，在「朝風」裏面聲如洪鐘、語驚四座是破壞氣氛的。<sup>41)</sup>

39) 謝祝芬，頁176。

40) 隱地，《自從有了書以後》，頁135。

從隱地書寫的散文議題來看，隱地嗜咖啡成癮的程度極深，他認為沒有歷史長久的咖啡屋，是一個城市的遺憾。<sup>42)</sup>於是臺北城裡各巷弄間的咖啡館，隱地幾乎都現身過，諸如東區名人巷的「綠光咖啡屋」，敦化南路SOGO四樓的「曼心咖啡屋」皆是隱地品嚐咖啡的地方。而臺大及師大附近的巷弄，更是隱地找尋城裡咖啡館的重要區域。其中一家叫「愛丁堡」咖啡店，在二、三樓上，上樓第一件事，就是脫鞋。喝咖啡之前先要脫鞋，實在夠「鮮」。……實在是一個安靜的好地方，適合沉思冥想，帶一支筆寫作，會有好成績。臺大靠羅斯福路的巷道裡，還有一家也可閱讀和寫作的咖啡館，名字富北國氣息，叫「挪威的森林」。屋頂高，坐在裡面神清氣爽。如果能種一棵大樹，牆上再貼一張大森林海報，會吸引更多的咖啡客。<sup>43)</sup>此外，同一區域的師大路巷弄間「布拉格咖啡館」及南門市場「三槐堂」咖啡或甜點蛋糕，也都成為隱地悠遊於臺北城巷弄間的聚點。

之所以沉迷於咖啡館的氣息，轉而書寫咖啡館的隱地這樣地認為，對文人藝術家來說，咖啡館是從自己家延伸出去的「第二客廳」。而歐洲的作家，或者說世界上每一個城市的作家，多的是以咖啡館為家的，像卡夫卡、海明威、布紐爾……讀他的小說或自傳，你就知道，他們幾乎整天在咖啡館裡思索、寫作、辯論、聊天。<sup>44)</sup>即使人是在家裡，每當工作累了，隱地還是會為自己煮一杯咖啡。他說：「對於我，喝咖啡，特別是喝曼特寧，代表可以放鬆心情，享受一天中的快樂時光。」<sup>45)</sup>黎湘萍注意到了隱地文章中充滿了咖啡上癮症，且他認為隱地書寫咖啡館的意義，除生命史之外，也跟臺北／臺灣／時代轉變有極大關聯，他說：「咖啡屋」連接著隱地個人生命經驗與臺北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滄桑歷史。這巨大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變革的歷史，原來竟如此牽動著每一個普通人的一生一世。<sup>46)</sup>

41) 子敏，〈約會在朝風〉，《愛喝咖啡的人》，頁216-17。

42) 隱地，《盪著鞦韆喝咖啡》，頁154。

43) 隱地，《盪著鞦韆喝咖啡》，頁149。

44) 隱地，《盪著鞦韆喝咖啡》，頁160。

45) 隱地，《盪著鞦韆喝咖啡》，頁162。

46) 黎湘萍，〈隱地的時間〉，《草的天堂》（臺北：爾雅出版社，2005），頁7。

### 3、文學拉丁區

唐諾（1958- ）自己剖析為何他寫作時，會選擇在咖啡館裡進行書寫 / 創作的理由，他說：「我在咖啡館裡工作，內容主要是寫稿，其次是讀書，當然偶爾也停下來喝口咖啡讓腦子漂流，並不排拒別人的談話進入我的耳中、別人的舉止進入我眼底。這樣子一個人不講話的坐咖啡館已超過十年了，而且愈陷其中。」<sup>47)</sup>他進而地將咖啡館當成自己家，於是攜帶好些家當在街上如同國外街頭上公園裡的流浪漢。從以上文字敘述，我們可以想見唐諾在進行創作時，視覺、嗅覺、聽覺甚而是味覺並非封閉式的思考，而是在城市裡的咖啡館裡進行靈感追尋。

相較於隱地而言是另一位作家李清志（1963- ）提及「臺北的拉丁區」概念，他寫到他從永康街開始，向南延伸，經過和平東路、青田街、泰順街，一直到溫州街地帶，因這一區域遍佈著咖啡店、餐廳、個性化藝品店、中外學者學生、藝術家的聚集，形成了一種都市內文風鼎盛且文化多元的特別區域，很類似法國巴黎左岸的拉丁區。因此他把這一帶的臺北街頭巷道，稱為「臺北拉丁區」。這一區最吸引他的，也就是林立的咖啡館；他認為咖啡從某些角度來看，是灌溉寫作的泉源，同時也是刺激思考的觸媒；在家裡煮咖啡喝，家裡觀景臺也不小，但在都市咖啡館喝咖啡的感覺卻是另一種感覺，會激勵出不一樣的文字。<sup>48)</sup>

從隱地、白先勇、唐諾再到李清志書寫下關於他們個人創作 / 日常生活與咖啡館之間的緊密關係來看，在咖啡館裡的時光，不論是獨處或小聚會，也許咖啡館是臺灣當代藝文人士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之一。<sup>49)</sup>「臺北

47) 唐諾，〈咖啡館和死亡〉，《作家的城市地圖》（臺北：木馬文化，2004），頁62-63。

48) 李清志，〈臺北拉丁區〉，《作家的城市地圖》，頁112-13。

49) 所謂的「日常生活」指的是「與每個人的生存息息相關的領域，是每個人無時不以某種方式從事的活動」、「那些同時使社會再生產成為可能的個體再生產要素的集合」。見匈牙利·阿格妮絲·赫勒 (Agnes Heller, 1929- ) 《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衣俊卿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

拉丁區」在李清志的認知裡是存在在臺師大一帶的咖啡館裡，而隱地、白先勇、子敏的「臺北拉丁區」是位於何處？六〇年代時的西門町／中山堂，不僅僅有著濃濃上海味，在這群藝文人士心裡，更是「臺北拉丁區」所在地。

#### 四、咀嚼臺北 / 食飲人生

人們可以透過嗅覺、味覺、聽覺來知覺及體會生活世界與周遭環境。嗅覺、味覺可以幫助我們辨認時空、激生回憶，與往昔的環境建立起聯繫關係。<sup>50</sup>變化表象的內裡有著停滯膠著的狀態，飲食活動經過長久歷史的累積、深入集體深層意識成普遍的認同。<sup>51</sup>飲食所涉及涵蓋的領域是一個龐雜的文化體系，與其交軌輻輳的政經、社會、歷史心理、化學等面向，彼此互涉層疊辯證。<sup>52</sup>新時空呈現的是一個多元化（多中心、多邊緣、無中心、無邊緣、中心摻合邊緣、邊緣摻合中心）的小吃空間，適合著各種年齡層各種品味的人。它不僅是飲食空間，同時也是一個文化空間、政治空間、歷史空間，更是一個人際關係交往的社會空間。<sup>53</sup>本節將探討隱地書寫臺北傳統 / 西式美食之間情感流動的面向與意蘊為何。

##### 1、上海記憶 / 家鄉美食

隱地回憶起青少年時期的他，因家庭經濟因素，於是常處於飢餓狀態。他認為在貧窮年代，沒有什麼東西是不好吃的，口中有任何食物，都是以感恩的心態來面對眼前的食物。<sup>54</sup>隱地日常嗜好，除電影之外，找尋味蕾上美好的記

50) 鄧景衡，《符號、意象、奇觀——臺灣飲食文化系譜》(臺北：田園城市文化，2002)，頁295。

51) 鄧景衡，頁234。

52) 鄧景衡，頁209。

53) 鄧景衡，頁244。

憶是他在臺北巷弄間遊盪的一個重要理由。當今的臺北，被視為美食之都，臺北飲食系譜，除臺灣本土飲食風情之外，也與國民政府撤退來臺有絕對的關係。一九四九年的歷史大變動，臺灣／臺北集結了大陸各地飲食口味和習慣。隱地同樣地認為臺灣／臺北飲食上的特色，就在於因歷史時空的集結，蘊釀了臺灣／臺北飲食的豐富度，他說：

臺灣餐飲最大特色可以吃到世界各地的菜，以及全中國各省的菜，從燒餅油條蟹殼黃火燒到餃子饅頭和各式麵點應有盡有，湘菜粵菜四川菜湖南菜江浙菜……讓人口齒留香，而臺灣小吃更是有名，從南到北，都有特產，價廉物美，讓人流連夜市；至於西方食物，從法國、德國、日本、泰國到印度菜，彷彿腸胃也在環遊世界。<sup>54)</sup>

對於飲食這件事，在隱地散文書寫裡，可以發現有極大量的書寫內容，且因飲食而書寫的商家、地點，可以說是反映了臺北人道地的在地生活，這些飲食書寫下地點與商家，既非五星餐廳亦非高級餐館，隱地在臺北巷弄間，總能找到屬於他味蕾上的特殊氣味。「隆記」的清炒蝦仁採用河蝦，依然保持著四十年前江浙菜在臺北流行時的上海味道。兒時的隱地只要挨餓，便會來到「隆記」，因此「隆記」也是隱地成長的臺北記憶之一：

我退伍後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書評書目的辦公室——博愛路五十七號，就在中山堂斜對面。從此午餐若未到中山堂餐廳用餐，也總是在中山堂四周的餐廳吃飯，隆記菜飯、明星咖啡廳的魚排飯和山西餐廳的麵食，更是最常去的地方。

隆記菜飯是彩娣阿姨開的餐廳。彩娣阿姨是媽媽上海時代的結拜姊妹。還有愛寶阿姨，小時候，我是阿姨抱著長大的。隆記的隆字，是我姨父王元隆名字的簡稱，剛來臺灣的時候，他是狀元樓餐廳的主廚，後來自己出來打天下，隆記成為饕餮客的最愛。如今姨夫、彩娣阿姨和他們的女

54) 隱地，《草的天堂》，頁344。

55) 隱地，《草的天堂》，頁347。

兒王明珠都已離開人世，但員工們繼續合力經營，成為臺灣少數已有五十年歷史的老飯店。<sup>56)</sup>

隆記餐館，除了是隱地童年裡美味的回憶外，同樣也成為遼耀東(1933-2006)懷想家鄉味蕾記憶的一個重要場所：

隆記開在中山堂對面弄堂裡，已經有四五十年的歷史了，是現在臺北唯一一家上海弄堂老飯店。還是多年不曾裝修舊店面，而且留下了幾個舊時跑堂的老伙計，點菜時我們以滬語談，倍感親切。<sup>57)</sup>

除中山堂 / 西門町之外，信義路、永康街和麗水街三個點，連起來形成一個東門三角洲，方圓一百公尺以內，至少有一百家餐廳，形形色色的小飯店，百味雜陳。<sup>58)</sup>隱地以身為臺北小市民，能有此一美食天堂，甚感幸福。

許秦蓁在她關於戰後臺北的上海記憶與經驗的研究中，論述了臺北何以充滿上海風的內緣與外緣因素，或許可以再補齊本文上述的論點。她說，六〇年代以降，上海的文化因子早已隨著大量移民渡海來臺，因此，在「臺北」一直有一群「哈海族」，他們不需要到上海冒險淘金、不需移民上海，更不需把家搬到上海去，就能感受到海派文化的醞釀與發酵，原因是，「上海的滋味」早就飄洋過海來到臺北，甚至在臺北落地生根了。<sup>59)</sup>

## 2、嘗鮮西式美食

臺北市的發展，自1970年代以後，人口與商業區逐漸從舊市區向東區（忠孝東路、南京東路等）、北區（士林、北投、天母等）與南區（公館、景美、

56) 隱地，《自從有了書以後》，頁134。

57) 遼耀東〈來去德興館〉，《肚大能容——中國飲食化散記》（臺北：東大圖書，2001），頁19-20。

58) 隱地，《自從有了書以後》，頁97。

59) 許秦蓁，《戰後臺北的上海記憶與上海經驗》（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頁186。

木柵等) 擴散, 形成分散的商業區, 各有其夜市與百貨公司為核心, 而且發展出階級與年齡的商圈結構。都市消費的空間的分散化與區隔化, 顯示臺北的都市消費空間逐漸進入後期現代性階段。<sup>60)</sup> 隱地散文在1970年以後, 也可以看到他書寫臺北美食的場域, 不再限於西門町 / 中正區一帶傳統美食, 或因現實經濟能力有了改善, 對於青少年過往口腔期的匱乏狀態, 反而訓練了往後口欲神經的敏銳度。於是臺北巷弄之間的美食天地, 都有隱地出現的身影, 且將其對美食的敏感度, 也以文字記錄。就算是年輕人喜愛的餐廳, 如東區IR, 也可見隱地點一客蛋糕、紅花海鮮湯及烤牛肉片沙拉, 獨自在靠窗的位置, 享受獨處時光。<sup>61)</sup> 汀州路上的藍調咖啡廳、延平北路波麗路、八德路五〇年代、永康街東林食府、雙城街的PUB、健康路的EZ、南京東路榮華堂, 都是隱地遊走臺北城的誘因。隱地的臺北飲食史, 從西門町 / 中正區出發, 擴及了臺北各行政區域, 舌尖上的挑剔不限於傳統東方飲食, 西洋 / 年輕人的口味, 一樣在他選擇內。

這樣的個人飲食經驗, 其實反映的是一個地區 / 場域之間人民從貧苦往富裕追求物質的過程。身為著名餐館負責人的薛麗妮說, 當臺灣人生活開始穩定, 開始要求一個比較好的用餐情境, 像臺灣的第一家西餐廳一波麗路 (1934) 就這樣開幕了, 當我們去西餐廳用餐, 就會注重用餐空間品質, 還有器皿的搭配, 會慢慢開始追求生活品質, 所以當消費者重視用餐空間跟品質時, 所有的餐廳就會加強自身的空間跟器皿。<sup>62)</sup> 隱地個人飲食發展史, 正是臺北飲食發展史典範與移轉的縮影。

不管是明星、朝風、中山堂, 亦或是波麗路。這些文學地景不斷且集中地出現在臺灣現當代文學作品之中, 我們援引王明珂 (1952- ) 對於「集體記憶」的論述, 可得到某些適合詮釋這樣文學現象產生的原因, 他認為「集體記憶」具有以下特質: 「一、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為, 人們從社會中得到記憶, 也在社會中拾回、重組這些記憶。二、每一種社會群體皆有其對應的集體

60) 王佳煌, 《都市社會學》(臺北: 三民出版社, 2005), 頁123。

61) 隱地, 《隱地極短篇》, 頁5。

62) 鄭晃二編, 《城市意象》(臺北: 田園城市文化, 2007), 頁93。

記憶，藉此該群體得以凝聚及延續。三、對於過去發生的事來說，記憶常常是選擇性的、扭曲的或是錯誤的，因為每個社會群體意識都有一些特別的心理傾向，或是心靈的社會歷史結構，回憶是基於此心理傾向，使當前的經驗印象合理化的一種對過去的建構。四、集體記憶賴某種媒介，如實質文物 (artifact) 及圖象 (iconography)、文獻，或各種集體活動來保存、強化或重溫。」<sup>63)</sup>於是，我們從王明珂對於「集體記憶」的理解，就可發現不同年代的創作者，或者有同樣的集體記憶；又或者，同一個世代會創造出屬於他們自己世代記憶。從隱地、子敏、白先勇等人的作品中可發現他們的世代記憶。而諸如唐諾或是李清志，他們的世代記憶又與前一代記憶有重疊處，但同時也有新的方向出現。

## 五、漫遊我城 / 我城傾斜

都市是條黑河<sup>64)</sup>

Simon Parker (1964- ) 曾這樣形容城市裡的「漫遊者 (Flâneur)」：漫遊者 (Flâneur) 追尋「稍縱即逝的時光」，像個「不安地徘徊於社會荒原的狼人」。他置身人群，卻不是其中一分子，人群裡的每張臉孔都戴上匿名面具，就像置身於「空間的畫妝舞會」。漫遊 (Flâneur) 也具有懷舊功能，或涉及對於逝去的時間、感覺、地景的著迷追憶。<sup>65)</sup>而長期在臺北生活的隱地，一如城市的漫遊者般，對於臺北城在時間與空間間的轉變，自有他自己的觀察與評述。只是現今的臺北，失去了過往在困難中成長的那份珍惜 / 感恩情緒，取

63) 王明珂,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 1997), 頁50-51。

64) 隱地, 《人啊人》(臺北：爾雅出版社, 1987), 頁93。

65) Simon Parker, 《遇見都市：理論與經驗》(*Urban Theory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Encountering the City*), 王志弘、徐苔玲合譯, (臺北：國立編譯館, 2007), 頁26。

而代之的是因現代化而產生的一些失落感。以下便以隱地觀察現今臺北這都會城市的一些想法，進行分析。

### (一) 傾斜中的臺北

都市經驗與記憶之間，在每個時代一向是以其多樣性為根源。但工業化進行之際，都市的急遽擴張，為這種複雜多樣性帶來了新的尺度，新的強度和節奏。快速繁複的變化，使得感官所接受到的景象和訊息，成為片斷化、流轉不居的拼貼。<sup>66)</sup>所以一座城市生命便會因為工業化時代的來臨，讓本來屬於城市裡的人文精神開始有了轉變的可能。而這樣的經驗值，是負向的，對於一個人文主義者來說，對於一個生命底層都是人文主義的隱地來說，機械化後的臺北，無疑地是一場災難的到來。例如，隱地以「正在傾斜的城市」這樣的形容詞來譬喻高度機械化後的臺北，他說：

臺北——一個正在傾斜的城市：一個無路可走的城市。臺北，其實早已變成一個停車場，只要有一塊小空地，就會有一部汽車或摩托車霸住它。臺北的街道巷弄早已由汽車連結成一條新的萬里長城。你想走路嗎？你想心情氣和的過斑馬線，手握駕駛盤的人，都在拿喇叭轟你；灰塵飛揚，馬路處處都像破碎的臉，還有殘破的紅磚道，這是臺北——一個正在傾斜的臺北。<sup>67)</sup>

#### 1、混亂化的城市

隱地及大多數的臺北人都享受了都會式的便捷，但也同時痛恨機械化的社會結構。其中原因，城市是一件不得已的事，住在城市也是身不由己的，那有

66) 王志弘〈城市、文學與歷史〉，收入義大利·Italo Calvino (1923-1985)，《看不見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 王志弘譯 (臺北：時報文化，1993)，頁16。

67) 隱地，《翻轉的年代》(臺北：爾雅出版社，1993)，頁96。

人人從城市撤退的可能呢？既然住在城市情非得已，我們當然得為城市辯護，尋找城市的快樂基礎，讓平凡的城市人可以安身立命。<sup>68)</sup>而在這趨向機械化的城市，隱地首先對於臺北街頭交通 / 汽機車表示了個人內心不滿。〈臺北的交通〉就直言了他的看法，他說：

臺北交通，是一則神話，是一齣荒謬劇，是一幅野獸派的大畫。

一九八八年的臺北，已經變成一個大停車場，馬路上、巷子裏、人行道、騎樓邊……都停著汽車，一輛接著一輛，形成了一條新的萬里長城。<sup>69)</sup>

在臺北生活，有時會心情不佳，譬如遇上交通阻塞，偶爾飯後想散散步，總是聞到汽機車冒出的黑煙，還有整個臺北無所不在的垃圾。<sup>70)</sup>

現代大都會都避免不了汽車進入市區的干擾。汽車對於都市的傷害，來自於城市的街道被打破成鬆散的都市蔓延，對任何徒步的人而言都顯得不一致和空虛。有錯綜複雜和密集的相互支持的美好市區和鄰里，突然被開腸剖肚。地標在都市生活的背景脈絡中被弄得破碎支離。<sup>71)</sup>葉維廉（1937- ）認為臺灣在八〇年代初以「經濟奇蹟」、「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驕傲形象炫耀於世間的同時，進入了「以物制物」的消費文化社會。人在一種肥安和安逸中，用一種被調整過的反射作用，即所謂機械化的固定反應來對應由商品所構成的符號—形象、色澤、音響和商品化的手勢。<sup>72)</sup>於是整個臺灣所呈現的氛圍，人文主義完全退居後線，快速取代緩慢、鋼鐵取代柔軟，一切以剛性機器化的標準，在這世間進行活動。隱地就曾發出這樣微弱的聲響，在他的日記本裡深深察覺到機械給人們生活帶來的影響是什麼，他說：我真喜歡緩慢。臺北的生活節奏愈來愈快。其實是機械逼我們快速。<sup>73)</sup>

68) 詹宏志，頁184。

69) 隱地，《眾生》（臺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119。

70) 隱地，《翻轉的年代》，頁129。

71) Jane Jacobs，頁369。

72) 葉維廉，《解讀現代、後現代——生活空間與文化空間的思索》（臺北：東大圖書，1999），頁161。

73) 隱地，《2002 / 隱地》（臺北：爾雅出版社，2002），頁77。

隱地認為，在臺北這個城市，要講生活美學，是很奢侈的一件事。走在街上，放眼望去，是興建中讓人感覺永遠結不了尾的捷運工程。開腸剖肚的馬路，到處可見，有些街道，居然找不到一棵樹。汽車亂竄，永遠是民眾的噩夢。<sup>74)</sup>臺北快要變成一個無路可走的都市，臺北還有人行道嗎？臺北人過街，心驚膽戰，連白髮都會一根根冒出來。<sup>75)</sup>除此之外，隱地也認為行人的權利不獲得尊重，他認為臺北紅磚道的破敗對臺北人來說真是一場噩夢。<sup>76)</sup>

都市空間學理上認為，街道不是理性規劃的對象而是權力運作的空間，交通移動不是理性之流動而是權力的意識型態。<sup>77)</sup>以此來看臺灣的交通建設，事實上是以開車 / 騎機車用路人為主要考量，而忽視行人用路權。這一點也可證明臺灣 / 臺北在都市化過程中的機械化過程中非以人本為中心，反映出的是權力的傲慢，對於處於弱勢族群人而言。

## 2、敗德化的城市

只要提起都市，不論是在一般的認知或是文學藝術上的再現上，總是不脫擁擠危險、浮華奢靡等等印象，猶如邪惡腐敗的大染缸。都市人則是疏離冷漠、猜疑狡詐高傲、唯利是圖但是寂寞空虛。<sup>78)</sup>大多數人，大致上會有這樣的體會，自然地，隱地對於臺北都會感，也有這種負面性的感受，他就曾這樣地感受到這樣的臺北城：我生活的臺北，如今不只是一個冷漠的城市，同時是一個很兇悍的城市。<sup>79)</sup>在〈靈與魂的拔河〉更把這樣情緒立體化地描述：

我在大安森林公園散步，紅花綠樹，這麼美麗的環境，我卻看到一位

74) 隱地，《盪著鞦韆喝咖啡》，頁122。

75) 隱地，《愛喝咖啡的人》，頁31。

76) 隱地，《眾生》，頁120。

77) 王志弘，《流動、空間與社會》，頁128。

78) 范銘如(1964- )，〈本土都市——重讀八〇年代的臺北書寫〉，《文學地理——臺灣小說空間閱讀》(臺北：麥田出版社，2008)，頁179。

79) 隱地，《翻轉的年代》，頁133。

中年男人在樹後面小便。他不臉紅，我倒真是感到不好意思。<sup>80)</sup>

敗德的結果，是倫理和價值體系崩盤，人性之惡被挑到極限，臺灣百姓從瞠目結舌變得見怪不怪，大家冷目以對。<sup>81)</sup>

### 3、政治化的城市

臺北的進步，有一部分得自於政治的自由度。但追求政治自由時的混亂症痛感，在九〇年代以後，不時出現在臺北街頭。而這些街頭活動，隱地有時也參與其中，且成為書寫內容。如〈從三二七到九月九〉：

三二七大會師，我也走進群眾裡，從廈門街轉同安街，再從南昌街走到南海路，就看到手執國旗的同胞四面八方聚攏來，我跟著人龍，走到羅斯福路，繼續往中山南路前進，人數之多，塞爆一整條街又一整條街，我的心中有一種海濤的澎湃，心想當年法國大革命的氣勢也不過如此，真高興自己生命裡有這樣特殊的一天，像我這樣的老書生竟也會走上街頭，是我自己作夢也不曾想到的。<sup>82)</sup>

看見國家統治者 / 政府高層不公不義之事，隱地完全顯現他知識分子的性格，著文批判當時政府的行為：

從最早的茅屋草寮、簡陋的木板屋、制式醜陋的公寓到今天豪華的現代建築甚至像一〇一大樓的出現，臺灣從貧困到富裕，從專制到民主，又從民主進入超現實的幻境，變成一個魔幻之島。什麼稀奇古怪的事都層出不窮，……。<sup>83)</sup>

80) 隱地，《盪著鞦韆喝咖啡》，頁26。

81) 隱地，《風中陀螺》（臺北：爾雅出版社，2007），頁48。

82) 隱地，《春天窗前的七十歲少年》（臺北：爾雅出版社，2008），頁69。

83) 隱地，《風中陀螺》，頁47。

看見臺灣正向紛亂邊緣走去，從政治冷感症到政治狂熱症，臺灣自1949到2006年，隱地以「臺灣超現實」<sup>84)</sup>一詞來敘說心中的感慨，徹底反映臺灣當時政治 / 社會真實卻又無法想像的現狀到來。

## (二) 以咖啡與文學救贖臺北

本論文在第二節當中，不斷提及隱地嗜咖啡癮的程度是多麼地深，他看見臺北的醜陋，心是煩亂的。但他找到了一帖幫臺北裝點美麗的藥方：

咖啡館是人生旅途中的驛站；就一個國際都市來說，臺北不夠美麗，臺北甚至讓人覺得醜陋；幸虧，在大大小小的巷弄裡，臺北有許許多多讓人覺得親切、溫馨的咖啡館。這些咖啡館前仆後繼，從早期的明星咖啡到現代的普羅，它們已自串成一曲歷史，我們能坐在每一個不同年代卻各具特色的咖啡館裡，的確是一種甜蜜的記憶。這是我們的幸福——是的，臺北人終於也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小小幸福。……

如果有什麼變遷是美麗的，如果有人問，臺北有什麼地方使人懷念，我都會大聲的說——咖啡館，一家又一家情調各異的咖啡館，使我們的城，終於也有了光環<sup>85)</sup>

隱地及大多數的臺北人都享受了臺北都會的便捷，但也同時痛恨機械化的社會結構。其中原因，城市是一件不得已的事，住在城市也是身不由己的，那有人人從城市撤退的可能呢？既然住在城市情非得已，我們當然得為城市辯護，尋找城市的快樂基礎，讓平凡的城市人可以安身立命。<sup>86)</sup>就如隱地所說的：「生活，是對醜的一種抵抗。」、「美，其實是一種反省。人肯反省，就能悟出一些美的道理。」<sup>87)</sup>、「讀書，讀書是一切智慧之源。人有疑惑的時候

84) 隱地，《風中陀螺》，頁41。

85) 隱地，《盪著鞦韆喝咖啡》，頁133-34。

86) 詹宏志，頁184。

87) 隱地，《盪著鞦韆喝咖啡》，頁122-23。

就要靠近文學藝術，文學使我枯竭的生命重新滋潤，只有文學，能醫治我們內心對生命的厭倦。文學提醒你要面對人生，呼喚你心中的善惡。一個，心中沒有愛，就會目中無人。」<sup>88)</sup>、「文學畢竟是人們的心靈休憩，當肉體被物欲掏空，當感官因貪婪而疲倦，人們還是會回到精神生活來。人們總有一天會相信，只有好的精神食糧可以醫治、充實我們貧乏的心靈。人要活得自在、瀟灑，惟有靠近文學。」<sup>89)</sup>

## 六、結語

一個熟悉的臺北在我記憶裡退隱，  
一個陌生的臺北，矗立在我眼前，我還是老臺北嗎？<sup>90)</sup>

白先勇為隱地《漲潮日》寫的序文〈克難歲月—隱地的「少年追想曲」〉裡說到，整個臺北對隱地來說，都太熟悉不過的了，從東門搬到西門町，從延平區搬到南機場的防空洞裡，臺北好像那個角落他都住過了，難怪隱地對於老臺北的地理環境瞭如指掌。<sup>91)</sup>生命史 / 生命書寫之所以動人與重要，一如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說的，著迷於回憶所具有的救贖和解放特質，回憶使我們得以從我們的過往，獲得一種對於當初困惑我們的情緒及感知的理解。對班雅明而言，回憶 (recollection) 恰恰意味了針對一種片斷且散亂的經驗印象的「重新收拾」(re-collection)，這些印象重組為有意義的敘事，以敘事自身不完滿的方式，試圖呈現出社會與心理整體的各個向度。<sup>92)</sup>而在隱地眾多散文書寫作品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對於臺北這一城市的情感之所

88) 隱地，《身體一艘船》，頁148。

89) 隱地，《愛喝咖啡的人》，頁118。

90) 隱地，《身體一艘船》，頁39。

91) 白先勇，〈克難歲月—隱地的「少年追想曲」〉，《漲潮日》，頁12。

92) Parker, 頁27。

以濃烈的原因，之所以不斷地敘事 / 書寫日常生活中的臺北，自然是發自於生命裡穿越時間與空間軸線所交纏下的情感所致的具體映現。

哈維 (David Harvey, 1935- ) 認為地方常常被視為「集體記憶的所在」，他進一步地提到地方感的保存或建構，是一種從記憶到希望，從過往到未來的旅程中的積極時刻。而且，地方的重構可以揭露隱藏的記憶，替不同的未來提供前景。<sup>93)</sup> 隱地書寫下的臺北城，有著過往褪了色的青春身影，同時也沾了過度都市化的臺北城，於是隱地他說了，一個熟悉的臺北在我記憶退隱，一個陌生的臺北，矗立在我眼前，我還是老臺北嗎？不，如今我是臺北鄉下人。<sup>94)</sup> 或許 Yi-Fu Tuan (段義孚, 1930- ) 的一段話，可以消解隱地心中記憶 / 既有 / 改變 / 變異中的臺北圖像：「人類團體幾乎皆趨向於把自己鄉土視作世界中心。人們相信他們在中心，因為認為所在的位置有無可比擬的特殊價值……這樣的“地方概念”必須給予極高的價值，放棄了此一概念，其他便很難想像。」<sup>95)</sup>

隱地的散文，除對臺北城這一六十甲子的書寫與記錄，我們也可以從其中發現其因海峽兩岸歷史因素所造成的離散現象，也充滿其書寫情感脈絡之中。除此，隱地認為，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如果缺少了具有特色的好餐廳、好書店，這個城市會是我們喜愛的、難忘的城市嗎？<sup>96)</sup> 隱地的臺北散文書寫裡，除了青春地圖的記憶書寫外，對於臺北這城市的餐廳、書店、咖啡館、記憶裡流動的時光著墨不少；如此的臺北，它會是令人難忘的都市嗎？想必，答案已出現。

93) Tim Cresswell,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王志弘、徐苔玲譯 (臺北：群學出版社, 2006), 頁62。

94) 隱地, 《身體一艘船》, 頁39。

95) Yi-Fu Tuan (1930- ), 《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潘桂成譯 (臺北：國立編譯館, 1998), 頁143。

96) 隱地, 《愛喝咖啡的人》, 頁112。

## 參考書目

### (一) 隱地散文集：

- 隱地, 《人啊人》, 臺北：爾雅出版社, 1987  
隱地, 《眾生》, 臺北：爾雅出版社, 1989  
隱地, 《隱地極短篇》, 臺北：爾雅出版社, 1990  
隱地, 《愛喝咖啡的人》, 臺北：爾雅出版社, 1992  
隱地, 《翻轉的年代》, 臺北：爾雅出版社, 1993  
隱地, 《法式裸睡》, 臺北：爾雅出版社, 1995  
隱地, 《盪著鞦韆喝咖啡》, 臺北：爾雅出版社, 1998  
隱地, 《漲潮日》, 臺北：爾雅出版社, 2000  
隱地, 《2002 / 隱地》, 臺北：爾雅出版社, 2002  
隱地, 《自從有了書以後》, 臺北：爾雅出版社, 2003  
隱地, 《身體一艘船》, 臺北：爾雅出版社, 2005  
隱地, 《草的天堂》, 臺北：爾雅出版社, 2005  
隱地, 《風中陀螺》, 臺北：爾雅出版社, 2007  
隱地, 《春天窗前的七十歲少年》, 臺北：爾雅出版社, 2008

### (二) 專著

- 王佳煌, 《都市社會學》, 臺北：三民出版社, 2005  
王明珂,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臺北：允晨文化, 1997  
木馬出版社主編, 《作家的城市地圖》, 臺北：木馬文化, 2004  
白先勇, 《明星咖啡館》, 臺北：皇冠雜誌社, 1984  
林文淇、沈曉茵、李振亞編, 臺北：麥田出版社, 2000  
吳潛誠, 《島嶼巡航：黑倪和臺灣作家的介入詩學》, 臺北：立緒文化, 1999  
洪月卿, 《城市歸零——電影中的臺北呈現》, 臺北：田園城市文化, 2002

- 范銘如, 《文學地理——臺灣小說空間閱讀》, 臺北: 麥田出版社, 2008
-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 《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 臺北: 明文書局, 2002
- 遼耀東, 《肚大能容——中國飲食化散記》, 臺北: 東大圖書, 2001
- 許秦慕, 《戰後臺北的上海記憶與上海經驗》, 臺北: 大安出版社, 2005
- 詹宏志, 《城市人——城市空間的感覺、符號和解釋》, 臺北: 天下文化, 1989
- 葉維廉, 《解讀現代、後現代——生活空間與文化空間的思索》, 臺北: 東大圖書, 1999
- 鄭晃二編, 《城市意象》, 臺北: 田園城市文化, 2007
- 薛益忠, 《都市地理》, 臺北: 三民書局, 2006
- 鄧景衡, 《符號、意象、奇觀——臺灣飲食文化系譜》, 臺北: 田園城市文化, 2002
- 謝祝芬撰文, 《武昌街一段七號》, 臺北: 圓神出版社, 2009
- Christian Norberg-Schulz, 《實存. 空間. 建築》(*Existence, Space and Architecture*), 王淳隆譯, 臺北: 臺隆出版社, 1984
- Encountering the City*), 王志弘、徐苔玲合譯, 臺北, 國立編譯館, 2007
- Italo Calvino, 《看不見的城市》, (*Invisible Cities*) 王志弘譯, 臺北: 時報文化, 1993
- Jane Jacobs (1916-2006), 《偉大城市的誕生和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吳鄭重譯, 臺北: 聯經出版社, 2007
- Mike Crang, 《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 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 臺北: 巨流文化, 2005
- Mike Featherstone, 《消費文化與後現代主義》(*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趙偉爻譯, 臺北: 韋伯文化國際, 2009
- Simon Parker, 《遇見都市: 理論與經驗》(*Urban Theory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 Tim Cresswell,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  
王志弘、徐苔玲譯, 臺北：群學出版社, 2006
- Yi-Fu Tuan, 《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 潘桂成譯, 臺北：國立編譯館, 1998

(三) 期刊 / 報章論文：

- 許秦綦〈追憶「走過的年代」——隱地《漲潮日》中的文化地理學〉, 《博雅  
通識—三校教師文史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桃園, 萬能科技大學, 2006
- 韓良露、李清志、楊澤 / 對談, 許正平記錄,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6年  
10月11日, B7。

<Abstract>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Myself in My City  
- The Writing of Taipei in Yindi's Prose

Huang WenCheng

Writing of c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on contemporary research projects of Taiwan prose. A strong sense of autobiography is to be found in Yindi's prose writings, his prose work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rsonal history. His writings not only represent a personal history, but also reflect changes of Taipei City in terms of space, as the city marches with the times. The thesis intends to analyze the prose of Yindi, and the inner spirit found in the dialogue between time/space and personal history in his writing of Taipei City.

Key Words : Yindi, Writing of Taipei, Stars Café, Cultural Geography, urban literature

투 고 일 : 2011. 5. 10. / 심 사 일 : 2011. 5. 20. ~ 2011. 6.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1. 6. 15.